

长征的故事

铁流万里

张磊 编著

丁巳 01 / 23

知识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诗。本书以精练的笔墨，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农红军是怎样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数不清的艰难困苦、胜利到达陕北的。书中对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穿插做了介绍，对长征的历史做了全景式的扫描。本书是广大青少年了解长征历史，学习革命传统的优秀读物。

目 录

一、长征的开始

被迫长征	(1)
长征先遣队	(6)
秘密使者	(10)
壮怀上征程	(13)

二、冲破封锁线

初战告捷	(17)
兵锋西向	(19)
进军湘南	(22)
血战湘江	(26)

三、转兵向川黔

进入西延山脉	(34)
不能入“口袋”	(38)
“北上”还是“西进”	(40)
强渡乌江	(44)

四、遵义的转折

夺取遵义城	(49)
众望所归	(52)
历史性会议	(55)
当机立断	(60)

五、钢铁的洪流

四渡赤水	(63)
跳出围堵圈	(68)
通过大凉山	(73)
“不做石达开”	(79)

六、川陕劲旅

夹金山下会亲人	(86)
嘉陵江畔鏖战急	(91)
放弃川陕苏区	(96)
战略方针的分歧	(99)

七、北上入甘陕

走出茫茫草地	(105)
反对分裂主义	(110)
突破天险大门	(115)
胜利到陕北	(119)

八、建立大本营

入陕第一师	(126)
举行奠基礼	(132)
争取同盟者	(137)
东征和西征	(140)

九、最后的征师

二、六军团上征程	(145)
乌蒙回旋战	(149)
红旗跃过金沙江	(152)
四方面军南下失利	(156)

十、红军大会师

共同北上	(161)
------------	-------

会师前的战斗.....	(165)
向着会师，前进！	(170)
伟大的长征.....	(174)

一、长征的开始

被迫长征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离开了原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这次大转移后来叫长征。

红军为什么要举行长征？这要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说起。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无数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中。但是，革命人民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全国爆发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在起义的烽火中产生了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井冈山道路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形成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其中最大的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统治。为了消灭红军，蒋介石组织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疯狂“围剿”。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连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反革命“围剿”。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集中全力“围剿”红军，镇压革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一再退让。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吞并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向国民党的东北军发动进攻。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进行抵抗，全部撤进关内，日本军队很快占领了东北，接着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

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反共、独裁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的相互冲突加剧。全国的政治形势对革命发展极为有利。

但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王明等人上台后，在全党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白区的推行，党在白区的阵地几乎完全丢失。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无法在白区立住脚，

于1932年10月迁入中央苏区。“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在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政治和军事路线。他们排挤毛泽东等反对“左”倾路线的同志，大搞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否定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战斗中形成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使红军和苏区的工作开始遭受损失。

1932年2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当时“左”倾领导人已经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但这时“左”倾路线在苏区尚未全面贯彻，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仍然遵循毛泽东所创造的打法，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变得更加疯狂，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继续与人民为敌。为了对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他向帝国主义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和大批军火，聘请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为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并请来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对国民党军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34年7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向各根据地进攻，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投入的兵力达到50万人。

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进行了精心的部署，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四路围攻：分别从北、西、南、东四个方向，向中央苏区扑来。顾祝同指挥的蒋的嫡系30多个师担任主攻。在作战方针上，他吸取过去几次“围剿”中长驱直入、分兵冒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堡垒推进”的所谓“新战法”，企图逐步蚕食和围困苏区，不断消耗

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最后与红军决战，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部队和自卫队有很大发展，并且有四次反“围剿”战斗的经验，如果战略方针正确，军事指挥得当，是完全可以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但是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在苏区占了统治地位，党在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挫折是难免的。当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正规战的打法，致使红军在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1933年9月底，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左”倾领导人博古、李德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分散兵力打阵地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敌人乘红军分兵之际，攻占了红军兵力薄弱的黎川。为了夺回黎川，“左”倾领导人又命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几次进攻失败后，“左”倾领导人又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许多战役、战斗均遭失利，红军伤亡惨重。

1934年4月中旬，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左”倾路线领导人以红军主力九个师同敌人死拼，结果虽然消灭了大量敌人，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遭到了重大伤亡，不仅没有保住广昌，而且还丢了建宁。广昌战役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

转折点，此后红军开始陷入被动，中央苏区日益被蚕食。

这一时期红军曾有一次转被动为主动的机会。1933年10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军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形势对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十分有利。但是，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没有利用这个形势，不去帮助十九路军，反而把他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把红军主力西调，使蒋介石得以调兵打败了福建军队。毛泽东当时曾提出，红军主力可以乘此机会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围剿”苏区的敌人回援，粉碎其向中央苏区的进攻。但“左”倾领导人不用此计，结果丧失了时机。

1934年7月，敌人开始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全面进攻。这时，“左”倾领导人又命令红军兵分六路“全线抵御”，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近一年，红军元气大伤，中央苏区日益缩小。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建议，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围剿”，红军应当由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从另一方向上实行战略进攻。可以主动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此计又不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长征先遣队

红军长征之前，曾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支北上，一支西征。

1934年夏，红七军团首先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运动。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并以此大量调动敌人，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从红色首都瑞金出发北上。全军团约6000余人，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

红七军团进军初期，声势浩大，行动迅速，战斗英勇，连克福建大田、樟湖板等重镇，迅速渡过了闽江，进军浙西，准备去皖南。这时，中革军委突然电令七军团威胁并袭取福州。红七军团攻打福州受挫，撤出战斗后，向闽东转移。这一仗暴露了红七军团的实力，招来了敌人的疯狂追堵。红七军团转战于闽东、闽北和浙西地区。

10月，红七军团冲破敌人的重围，转移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

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军团政委乐少华率领，转战于闽、浙、皖地区。曾一度攻至杭州、芜湖一带，威胁到敌人统治心脏南京。蒋介石急调七个师、六个旅及浙江、安徽等省的反动武装约20万人对红十军团进行疯狂的围堵

和夹击。在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一仗中，红十军团作战失利。此后，敌人以 20 多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红十军团。红十军团转战于皖、浙、赣边境与敌人周旋，主动打击敌人。由于部队伤亡日益增多，补给日趋紧张，敌人的包围圈日渐缩小，红十军团处境险恶，不得不突围南下，回师赣东北老根据地休整补充。

1935 年 1 月，红十军团在回师途中，遭到敌人截击。主力在怀玉山地区陷入敌人重围，经过七昼夜浴血苦战，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被俘。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流芳千古的篇章，后在南昌英勇就义。

红十军团余部由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转移到闽、浙边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征战六个多月，行程 5600 多里，在敌后广大地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打击敌人，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芜湖及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吸引了 20 多万敌军于自己周围，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在红七军团北上的同时，中央又派出红六军团为西征先遣队。

1934 年 7 月 23 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要求他们以积极的行动，迫使湖南敌人重新部署，打乱敌人紧缩对中央苏区包围的计划。

经过充分准备，1934 年 8 月 7 日，红六军团 9700 多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踏上了西征之途。

六军团从江西逐川的横石地区突围，冒着南方的酷暑，日夜兼程，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在这里，部队略作休整，全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宣布了西征军的领导机关组成。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向西经郴县、桂阳、新田等县，向湘江东岸的蔡家埠一带进军，准备抢渡湘江。

红六军团出敌不意，突围西进，使敌人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慌忙调集两个师尾随追击。同时派两个旅加四个保安团沿途拦截。广西军阀也急忙派出两个师堵截红军，以防红军进入广西。湘敌刘建绪发现红军抢渡湘江的意图后，急调重兵把守湘江渡口。广西军阀也派兵向道县、零陵运动，企图阻挡红军西进。

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红六军团放弃了在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向新宁、巫山地域转移，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到达阳明山地区，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但到达以后，发现这一带的条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这时，敌人围堵过来，红军遂转入白果市，摆脱了四倍于红军的敌人。

此后，红军为甩开四面追堵的敌人，时而向东，时而向南，进而掉头西进，进至江华、道县之间。红军从这里渡过潇水。随后进行了永安关战斗，打破了敌人三个师企图阻截红军的计划，并继续西进，准备渡过湘江。

这时，敌人集结大量兵力尾随红军而至。为了顺利渡过湘江，红军在灌阳县的文市附近抢占有利地形，痛击尾追之敌。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敌人八个多团，并从全州以南的界首，从容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县城。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向城步、武冈地区前进，力求寻机消灭敌军一部，并转向

湘西北，与红3军会合。根据这个指示，红六军团由西延出发，向西疾进，准备在城埠地区袭击敌人，但未能得手。这时，敌军已集结到靖县和绥宁地区，红六军团知道敌人部署后，决定改变计划，夺路南下。先袭占了通道县城，后渡过渠水，西入贵州。在通道城西北40里处，红军杀了一个回马枪，痛击紧追而来的湖南军阀两个团，消灭敌人400多人，缴枪300多支。此后，敌人再也不敢孤军紧追了。

红六军团继续西进，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各族群众的协助下，红军渡过清水江，突破敌人共18个团的围堵，在施平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攻占了黄平县城。随后，红六军团根据军委指示，经瓮安、猴场，转向东北方向前进，去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

这时，敌人集结了24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军堵截和包围。而红军对此一无所知。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在进入甘溪地区时，由于红军前卫部队一时疏于戒备，遭到广西军阀部队第19师的突然袭击。部队被截为三段，形势极为严重。红六军团领导果断决定，部队分三路突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

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军团主力突围后，转战于石阡、镇远、施秉一带。这一带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道路难行。全军将士历尽艰辛，忍饥挨饿，用马刀、柴刀披荆斩棘，开道前进。任弼时同志身患疟疾，依然手拄拐杖，领导全军行动。转移途中，红军后卫红25团遭到敌人截击包围，损失惨重。18师师长龙云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壮烈牺牲。

经过艰苦转战，克服重重困难，红六军团分路突围的三

支部队，终于先后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3军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西征，历时79天，历尽艰辛，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在西征过程中，探明了沿途敌人的兵力，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先后出征，是红军主力长征战略行动的一部分。这两支先遣部队的出征，虽然没有实现当时中央领导人希望的大量调动敌人、改变敌人“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部署、减少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但是，这两支部队的远征，也牵制了一部分敌人，并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北上和西征是红军长征的前奏。

秘密使者

为了红军的顺利突围转移，在突围前夕，周恩来、朱德等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一次秘密谈判。

陈济棠是蒋介石封的“围剿”军南路军总司令。他是国民党广东省地方军阀，与蒋介石这个最大的军阀素来矛盾很深，曾数次参与反蒋。“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加剧，陈济棠在国民党一些地方势力的支持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公开与南京政权闹独立。蒋介石无时不

想清除这一地方势力。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分四路“进剿”中央苏区。陈济棠被封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深知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惯用手法，就是“借刀杀人”，让他进攻红军的目的是“一箭双雕”，既可以消耗红军的力量，又可以削弱他的实力。待到他与红军两败俱伤之时，蒋介石可以毫不费力地坐收渔翁之利。陈济棠一直力图偏安广东一隅，永居“南天王”宝座，并不热心替蒋介石去打江西的红军，因此他“进剿”红军行动迟缓，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

1934年1月，蒋介石镇压了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以后，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进驻福建，陈兵闽西南地区，威逼广东，同时又以给陈济棠巨额经费为诱饵，要陈济棠进军，配合何键西路军的行动。蒋介石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蒋的嫡系部队实力强大，陈济棠若完全按兵不动，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他不得不暂时俯首听命。但他在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后，又心存疑惧，怕蒋介石乘虚而入，占了他的地盘，担心与红军打硬仗，消耗自己的实力。而且他认为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的“中央”军从江西进入广东的最好屏障。因此他希望与红军建立关系，达成某种协议，搞外打内通、明打暗和。他表面上虚张声势，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从蒋介石那里得到饷械，暗地里派人与红军接触，以便达成互不相犯的默契。

陈济棠的这一动向马上被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离开了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仍然为全党全军的战略大局操心。他根据陈济棠的动向，分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长期矛盾，提出要利用矛盾，各个击

破。他指示赣南省委负责人何长工、刘晓等，做陈济棠的工作，加强宣传，建立关系，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赣南省委根据这些指示，对陈济棠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9、10月份，红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与陈济棠派来的代表进行了一次秘密停战谈判。随后，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赞同我党的共同抗日的主张，并表示，要派出他的代表与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协议。

红军在突围前夕，进行了这次重要谈判。

谈判在寻乌县一个寂静的小山村进行。10月7日，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打扮成富商模样，进入粤军防区。为了掩人耳目，粤方准备了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并派了一连的士兵护送。一行人穿过筠门岭后，继续走了40多里，来到一座小洋楼前，谈判就在这座楼内进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军代表住在楼下。谈判进行了三个昼夜，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以及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

谈判结束后，双方代表举杯祝贺谈判成功。这时红军代表接到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这是事先商量好的秘语。何长工、潘汉年明白，这是说，中央红军开始转移了。粤军代表很敏感，马上试探性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何长工机智地回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表示祝贺之意。”粤军代表也就不再怀疑了。

谈判结束后，何长工、潘汉年匆忙赶回会昌。这次谈判的结果，对红军战略转移将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这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了